

人化的體驗竟也讓人有歷史化的聯想，若是，該是多麼的反諷啊！

四 故鄉即童年

唐小兵在他的《英雄與凡人的時代：解讀20世紀》裏分析鄉土小說時提到，故鄉情結實際上反照了成人生活（我們也可以理解為現代生活）所引發的焦慮和不安（唐小兵：《英雄與凡人的時代：解讀20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頁51）。因此，對故鄉的懷念固然是對某個特定的地域的鄉愁，但也可以是超越了地域性的對於過去的時光的鄉愁。北島在〈序：我的北京〉中寫到：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認如今的北京。在我的城市裏，時間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氣味兒、聲音和光線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廟恢復原貌，瓦頂排浪般湧向低低的天際線，鴿哨響徹深深的藍天，孩子們熟知四季的變化，居民們胸有方向感。我打開城門，歡迎四海漂泊的遊子，歡迎無家可歸的孤魂，歡迎所有好奇的客人們。（頁xi）

如果你也相信故鄉即是童／少年的時光，那麼，北島筆下城門開的老北京，便也可以是五湖四海裏眾人的故鄉。

現代上海都會的經濟情感

● 范 雪



葉文心著，劉潤堂、王琴譯：
《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葉文心的《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43-1949*，以下簡稱《上海繁華》，引用只註頁碼）是近年來民國上海研究的一本力作。從本書涉及的廣博的一手材料和參考書目，不難看出作

所謂「經濟情感」，在《上海繁華》一書中特指現代上海以經濟為中心生成的行為與觀念。全書圍繞這一議題展開，突出呈現了經濟對於現代上海城市生活與職場群體的重要意義，以及伴隨都市經濟而生的生活風格與情感倫理。

投身於新型城市的企業生活、在當中建立起價值認同與人生期盼的職業青年，是葉文心關注的一個重點。本書細緻講述了1930至40年代上海職業青年的生活、遭遇的危機與他們的轉變。

者對此領域的把握能力。《上海繁華》基於民國上海研究的若干成果，在更為博深的命題下討論這一時期上海的都會經濟文化與「經濟情感」。所謂「經濟情感」，葉文心在本書中特指現代上海以經濟為中心生成的行為與觀念。全書圍繞這一議題展開，描繪了一幅民國上海都市輝煌的斑斕圖卷，突出呈現了經濟對於現代上海城市生活與職場群體的重要意義，以及伴隨都市經濟而生的生活風格與情感倫理。

作者在本書中借用美國社會學家格林菲爾德 (Liah Greenfeld) 的「經濟主義」替代「資本主義」的說法 (頁19-20)，強調1843年上海開埠之後，在現代城市中興起一套以經濟問題為中心的行為與心態。因此，作者所矚目的並不是企業經營、商業網絡等經濟史議題，而是以經濟活動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在這一點上，本書分享了近十幾年來，以李歐梵、馮客 (Frank Dikötter)、高家龍 (Sherman Cochran) 等學者為代表的，從文化史的角度討論民國上海政治、商業、文學、社會等議題的研究取向。作者亦在全書中廣泛借用印刷文化、視覺消費、文化空間的研究方法，自如地講述着民國上海的商人群體、城市景觀、職業青年與經濟情感。

十九世紀下半葉上海開埠後，城市中逐漸出現了一種新的商業文化。商人生活在傳統與現代、中西混雜的文化環境中，他們所象徵的財富在社會上備受關注，而他們主導的經濟活動也成為與國際關係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國家事務。葉文心在第一章討論的核心問題是，活躍於都市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商人

階層，如何取得文化上的合法性。在這一過程中，「商戰」的觀念極大地強化了商人與愛國之間的聯繫。而一系列跨越「官」、「商」，身份角色複雜的商人則進一步參與構建着商人與國家、經濟與國家的關係形態。

在商人群體逐步建立起其文化合法性的同時，圍繞着「經濟」的新群體與新知識也在逐漸興起。本書第二章中，1920至30年代上海，「商學」逐漸成為一門顯學，商業學校、中華職業教育社等教育機構催生了一批新的城市職業群體，他們在金融、出版、教育和新聞行業佔據重要位置。同時，圍繞着經濟興起的新知識、法律，乃至語彙逐漸深入城市生活，成為上海職場群體的生活核心。

葉文心在第三章中深入考察現代上海形象生產的議題。許多學者都討論過民國時期上海眼花繚亂的城市物質景象：來自西方的貨物與由內地湧向上海的土特產品共同陳列在商店的櫥窗裏；百貨公司改變了商業經營的模式，改變了城市街區的面貌，也促生了城市形象生產的新工業。但是葉文心對城市景觀與形象生產的討論並未就此而止，而是將繁華的城市圖景置放於「國貨運動」的背景中，富有愛國激情的消費者與現代科技、企業、國家在共同的視覺期望中，建構了對上海城市形象的想像。

投身於新型城市的企業生活、在當中建立起價值認同與人生期盼的職業青年，是葉文心關注的一個重點，也是此書論述最為精彩的部分。從第四章到第七章，葉文心細緻講述了1930至40年代上海職業青

年的生活、遭遇的危機與他們的轉變。銀行員工在工作生活中建立的時間觀念與紀律意識，正是經濟在民國上海興起之時，形塑觀念和生活方式的過程。而現代印刷工業，也參與建構了職業青年共同體的新信仰——一種相信科學與繁榮將促進個體實現與國家富強的信仰。

葉文心在第五章聚焦於鄒韜奮主持的《生活週刊》，由此考察一種普遍的職業青年的價值系統和生活風格。而1930年代從「職業」青年到「進步」青年的意識形態轉變，則扎根於以經濟問題為中心的對公共生活與民生狀況的關心。第六章轉而考察左傾刊物《讀書生活》，左翼的言論將對個人與家庭困境的討論延伸至社會制度層面，從而在根本上質疑了以小家庭為核心的幸福可能。個人的出路需要整體社會環境的改變，其中亦包括經濟運作邏輯的轉變。第七章中，抗日戰爭的爆發一方面強化了左翼言論的效力，另一方面企業的領導層也在逐漸喪失話語權，而在新的話語邏輯中，他們從值得敬仰的「家長」變為剝削工人的「資本家」。正如我們在顧準的例子中看到的，在從「家長」到「資本家」的轉變中，上海以及1920至30年代的職業青年已經為新政權的到來做好準備（頁270-77）。

在討論民國上海經濟文化的同時，不斷對共和國時期的經濟制度、經濟文化予以回應，是此書的另一亮點。作者在第四章中描述的中國銀行的宿舍大院與社會主義時期的單位制度有着明顯的相似之處，銀行職員在新政權到來之前已然有了集體組織生活的經驗。第七章中抗戰期間銀行職員關於社會公

平的輿論，也在某種程度上弱化了家長制的模式，為體制的轉變做了準備。葉文心的研究無疑推進了我們關於「1949」斷裂與傳承的認識，呈現出關於中國現代城市經濟體制與文化更為複雜與細緻的圖景。

本書建立在對歷史檔案、通俗刊物（主要是《生活週刊》和《讀書生活》）、企業報刊等一手材料的全面把握之上。全書的篇章架構乃是以民國上海的經濟文化為中心命題，串聯多個子命題，總體上遵循時間順序的原則。儘管各章之間的關係線索並不一目了然，但其內部邏輯非常清晰，而這種以命題為主導的體式，也使得作者自如地支配筆墨，詳盡細緻地再現民國上海的經濟與城市、教育、市民、青年人的生活 and 思想等諸多議題之間的聯繫。

然而，圍繞着「經濟情感」，此書仍有其他未能觸及的子命題。比如，在都市經濟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女性，她們的行為與觀念是否會為我們提供一幅非常不同的關於現代都市經濟價值倫理的圖卷？若將上海置放於江南地區、全國，乃至全球的視野下，如何定位、理解民國上海「經濟情感」的特殊性與普遍性？諸如此類許多議題，有待後來人進一步地探尋。

對於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上海史研究的學者而言，葉文心的這本書無疑在多個層面上都有所啟發。而對現代文學、文化研究的學者來說，本書對城市群體心態與倫理的探討，提供了更細緻的關於民國上海的認識。另外，作者從城市空間、報刊文化等多個角度對「經濟情感」的探討，在方法論上也為其他領域的學者提供了視角上的啟示。

在討論民國上海經濟文化的同時，不斷對共和國時期的經濟制度、經濟文化予以回應，是此書的另一亮點。葉文心的研究無疑推進了我們關於「1949」斷裂與傳承的認識，呈現出關於中國現代城市經濟體制與文化更為複雜與細緻的圖景。